

## 哲思的政治與政治的哲思（下）

陳玉峯

～印度阿占塔（Ajanta）一座壯麗的石窟中有條銘文：「一個人只要在世間留下清晰生動的記憶，他就會繼續在天堂享受幸福。因此，人們應當在山間建立一座紀念碑，讓它永存於世，與日月同輝」～

西元前 2 世紀以迄西元 5 世紀，開鑿阿占塔洞窟、創作佛教曠世壁畫的藝工們，如今在兜率天安享淨土極樂，阿占塔是世界重要文化遺產之一。可是，誰都知道，原初佛教或佛陀涅槃後 5 百年間，幾乎是絕對唯心的佛教思想，根本不許偶像崇拜，既無佛像更無廟宇，充其量只有抽象、簡單的幾何圖案聊作象徵而已。然而，抽象唯心太神秘，要宣教得造神。人民永遠需要神，「如果沒有，也得創造一個」！唯心乎？唯物？心、物大戰，靈肉火拚，有人的歷史就從未間斷；奇怪的是，先有「唯物」，而後產生「唯心」，再而超越「唯物」，從而締造人種文化。事實上，唯心、唯物本自一體，人種卻老是在撕裂、對抗、和解，以及再循環中才能進步。

阿占塔銘文的關鍵在於一個人一生中「留下清晰生動的記憶」，而不在具象的形體或物質，但物質也是留下文化記憶的載體，提供傳承與再創造的依據。台灣 20 世紀百年銘文中，李前總統絕對是「清晰生動」的一脈記憶。

2007 年 12 月 24 日，阿輝伯在「李登輝學校長老教會牧師班」座談會上，宣講了《新時代台灣人—我的「脫古改新」》一文，闡述 20 世紀日治、國府治台的台灣人，乃「邊緣人」的處境與地位，是外來民族的奴隸，也是自己民族的奴隸，但 2.28 激發台人「我是誰」的主體意識反思，他則在因緣際會下從政，且透過「寧靜革命」的手段，反抗中國「託古改制」，或發展停滯的法統神主牌，從而脫離亞洲價值（其所謂「脫古改新」），進臻台灣主體及民主制度，而欲達此目的，文化建設（註：文化革命）是根本。他講演的後段，剖析他對生命意義的探索，以及一生為台灣奮鬥的思想依據；他將此等思惟化約為對死亡、自我、

超越與信仰的反思與證悟。可以說，該講演或內容，誠乃他在總統卸任後，總結其一生，向自己、向歷史、向神所做的告白與交代，然而，就實質內容而言，並無超出《台灣的主張》一書。

筆者在去年底並無聆聽他的講演，現場如何不得而知，然而，從他的文稿後半看來，只用了大約 6 百字，說明他由生物性，如何超越而轉化為精神性、文化性的人；揚棄小我、私我，如何證悟「不是我的我」、「我是主在內的我」（註：大我、無私的我、信仰的我），也由此等哲思從事政治活動，產生一項項對台灣民主化、主體化的務實政策。

然而，他的文稿太濃縮，對超越死亡的說明，係引述海德格對尼采超人說之過於化約的詮釋；在信仰轉化或轉化信仰的過程則隻字不提，筆者懷疑聽眾或讀者難以領略其要旨。也就是說，李前總統在去年底迄今的人生總整理言簡意賅，屬於太廟堂銘文之類，常民難以理解；而 3 月 11 日他與筆者家常式的言談，使用的是生活語言，請容我寫成可以擺放在 7-11 的贈閱品。然而，以我對東、西方文化的瞭解，我實在無法全然同意李前總統過於簡化的特定看法，但他實在擁有許多單純執著的可愛而值得尊敬。我可能會誤解他的表述，但我不可能只是去歌頌他，我往下要述說的，毋寧只是在他的著作中（例如《台灣的主張》），一些也許次要或細節的銜接而已。我沒忘記訪談他的原意並無目的，只是去看看一些值得欣賞、感恩的台灣人物。

阿輝伯所認知的中國政治制度與文化，最核心的結構是五千年閉鎖性的「法統」主義，無論如何改朝換代，骨子裏從未改變，從來都是「託古（不）改制」；中國歷史只有皇權制度史，皇帝或政治的目的是權位的鞏固、版圖的擴大、財富的剝削，而罕見有老百姓的生活與價值；朕即天下，奉天承運、君權神授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而以現代話來說就是「一個中國」。有史以來，中國嘗試進行的政治改革，只有商鞅變法、宋代王安石，以及清代戊戌變法，但三次都失敗。19-20 世紀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亦功敗垂成，共產主義更是中國化。歐洲人認定，中國政治就是「亞洲式的發展停滯」，而李前總統最大的「野心」，便是在台灣打破這五千年的魔咒，否定「亞洲式價值」或「法統式的中國陰

魂」，因此，他說他「脫古改新」。

他的這些見解，大抵出自清末、民初，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，例如魯迅、胡適、郭沫若等等，骨子裏正是西潮東漸引發的異文化大衝擊，且如蔣夢麟的名言，佛陀騎著青牛來到中國，耶穌可是搭乘砲彈從天而降（註：我加以改寫）。

然而，談這些太沈重，我回到與阿輝伯的對話。

「……光復之初，大家都很高興，沒想到不多久就發生 2.28。那時，我強烈地感知台灣人從 2.28 之後，開始質疑『我是誰』；大家普遍有種感覺，卡早是異族人的邊緣人，除了少數如辜家等較特殊者之外，絕大多數台灣人都在核心外；而現在說是同族，卻也是邊緣人。即令不是古埃及時代那種純做工型的奴隸，在政治、文化…上的確是同族人的奴隸。而 2.28 這一刺激，我第一次看到全台灣、全國性地站（出）起來。但是，也只有在台中的謝雪紅最有辦法而已，那時又逢她身體很不好的狀況，但她勇猛地指揮作戰。至於其他地區、許多人，大多含含糊糊……」

「歐吉桑，您自己也是在 2.28 之後才覺醒的嗎？」

「不！卡早我做日本兵仔，還做到指揮官少尉，對這些事情早就心知肚明了！」言下之意，他早因殖民地次等人種的遭遇等等，以及早熟、唸書的反思，內心了然，而且，他受完整的日本教育，對中國歷史的瞭解來自異文化的見解，有助於跳脫本位醬缸。

「……日本老師教的中國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，光是鴉片戰後中國史就教了一整年……，我們做囡仔時就知道蔣介石政權如何、如何，他邊北伐邊與宋美齡談戀愛……，而孫中山先生真的是想改變中國的制度，可惜理想難竟……，如今大量外國資金、人才、技術湧進中國，看看是否能改變中國？共產黨本身與歷來中國朝代如出一轍，只在乎他們的黨如何長存、確保，而不在乎百姓生活的好壞、勞工問題、農民困難……，攏無在解決……；中國完整的歷史都是我後來自己唸的……」

「2.28 那當時，中國人叫各地的台灣人成立『調解委員會』，這些委員會多是那些愛出風頭吔，啊攏去參加。我也去門邊看看他們在開啥

會，看起來，我心內想，這些人怕都是會壞喔！（註：後來果然很慘）……」

「終戰或差不多 228 以後，我開始由唯心論轉變為唯物論者。之前我坐禪自制，要求克服自己，將精神力提升得更高，更無我，但後來覺得只靠這一套唯心論是不夠的。特別是戰後，看見大家都沒東西吃，我也到廣島看原子彈爆炸後的慘況，在這現實的基礎上，我變成唯物論者」

「戰後大約 10 年之內，我是馬克斯主義、共產思想，我認為讓百姓有得吃、活得好才重要……，於是，我內心最大的問題就是唯心與唯物的衝突，我不能平衡，無法解決這困境，因此，我開始去找『神』，到底有沒有神？」

「……我在 32~33 歲前後開始尋找神。尼采說神已死，我說我要去找尋真正神的存在……。台北的教會我走訪了 5 年，我怎麼聽牧師的佈道也沒法度聽出神的存在，只聽得愛睏……。後來，在一個沒牧師的集會上，遇見一批由前輩弟兄帶領後來者的團體，他們很激烈地討論聖經的問題、神的種種問題，從而我受到很大的影響，……」

「神學上種種理性上、科學上不能相信的問題太多，然而，你不能相信這些不能相信的問題本身，代表你沒有信仰，你不懂得去信仰。信仰絕非理性的，而人的問題也不只是理性的；你若站在認識論的角度，要去認識神的存在，這是不可能的代誌！問題只在於你信或不信，那麼，信的問題是啥？信就只是你去信就好了，信是實踐！沒看見就去信嘛！就像耶穌復活後告訴多馬的話：『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；那些沒有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！』」

「如此一來，感覺很自然，只是去相信它就是這樣子。這對知識分子來講，是件很艱苦的代誌，得放殺自己的思考方式，改以信的方式來信仰……，此過程的一些心情、看法達成後，我就受洗，從此，我開始感覺我，不是我的我，而是相信耶穌がら，我，是耶穌在裏面的我。這樣的一個我，對政治啦、各種人的問題啦，就變得都不一樣（學問則是另外一類的代誌）！不是法律問題、不是做不做官或官僚的問題……，問題是老百姓住得如何、過得如何？他的困難在什麼所在？你有信仰，所

以才有這樣的動機，才會去瞭解社會為什麼貧富差距那麼大！你若有宗教上的公義與疼惜的心，你對所有公共事務的態度就會不一樣。你若執政，你就有了動機……」

「我在高等學校一年級時……」阿輝伯就是在這時，切入他年輕時代對生死的看法，而後延伸出近來對《千風之歌》的一番感性的陳述。

我可以理解青年時代的他，對生死的關注，為何會變成一生價值依歸的源頭，因為我這一世代也是如此。同一年齡前後，我只在乎人生的終極答案，且背負著它究竟一生。事實上問生問死同一回事，只是在問活著幹嘛，有何意義？而貫穿阿輝伯一生的價值告白，他將之歸宿於信仰的轉折，而且，他對信仰的詮釋簡單、直接、誠實，武斷得超越，沒有任何多餘。

人生沒有太多理由，活著不作過多解釋。「竹影掃階塵不動，月穿潭底水無痕」信仰不需理由，妄相中而活得自在。

2008年4月6~21日，走訪了一趟印度宗教苦旅之後，我更可了然阿輝伯一生的告白。